

# 形而上学的“生产”观念与生产辩证法<sup>\*</sup>

## ——论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批判及其误读

夏莹<sup>\*\*</sup>

**【摘要】**本文通过批判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生产主义”的批判,明确了鲍德里亚对“生产”的界定,即一种以观念来推导现实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基于对这种“生产”观念的批判,本文分析了鲍德里亚误读了马克思哲学中的劳动、价值以及辩证法等诸多概念的根源:即忽视了生产辩证法对社会现实的切入,从而将马克思归入旧形而上学的藩篱。

**【关键词】**生产;形而上学;辩证法;劳动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09)02-0007-06

对于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观念问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从多种视角出发进行了阐释,但最终却总是落脚在对其生产主义(或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之上。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可谓其中的典型代表。在此著作中,鲍德里亚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生产”观念本身,并以此为切入点展开了对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在这一批判中,鲍德里亚不仅宣布了与马克思的决裂,而且就其对生产的理解而言,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存在着根本性分歧。本文将借助于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对峙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一批判,以回答鲍德里亚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谈论“生产”,马克思又为什么以生产为切入点来展开其对社会现实的分析 and 批判等问题,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来发现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批判的重心及其误读,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展开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理解。

—

为了回应鲍德里亚的批判,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什么是鲍德里亚所批判的“生产”?一方面鲍德里亚不是将“生产”作为一个概念来加以批判,这使其能够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流于简单化的生产主义批判;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将生产作为

一种现实的活动来加以批判,这使其陷入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读。鲍德里亚将生产作为一种形式,一种思维方式。对此,他在《生产之镜》中一开篇就明确指出:“生产方式的批判理论没有触及生产原则,生产方式所描述的所有概念,也只是说明了生产内容的辩证的、历史的谱系,并未触及生产的形式。”<sup>①</sup>可见,鲍德里亚认为在其之前所有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批判,都仅仅关注于生产的内容,如对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等各种“生产”的批判,而忽略了生产的形式。在鲍德里亚看来,只要生产的形式没有被触及并有所突破,那么批判就未真正达及富有革命性的颠覆。所以不仅马克思,而且其后继者,诸如“泰凯尔”无限制的“文本生产力”,德鲁兹的无意识都囿于生产内容的藩篱之中,因此不管其言说方式如何激进,本质上都不过是“生产内容的辩证的、历史的谱系”。<sup>②</sup>

因此,如果要实现一种真正彻底的批判,必须触及到“生产的形式”。在这一特定视域中,马克思所强调的物质生产、人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内容而已,并且本质上属于生产形式作用于不同领域的结果。因此,任何试图用生产内容的多样性来反驳鲍德里亚批判的尝试都将是一种隔靴搔痒,因为它们没有和鲍德里亚站在同一种话语语境下来谈论同一

\* 本文为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创新基地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05FCZD008;同时本文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B103)和教育部分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在此|并表示感谢。

\*\* 作者简介:夏莹(1975-),江苏南京人,现为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天津300071)

①②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参见第1页。

问题。只有当“生产”意指一种生产的形式，或者一种生产的原則的时候，它才是鲍德里亚所试图批判和否弃的对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的探讨也需要从生产的内容层面跃入生产的形式层面。

接下来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生产的形式？或者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生产意指着什么？生产在此代表着一种特殊的运作模式。“生产只不过是一个符码，这个符码强加着这种解码方式，这种解码方式既没有终极目的、密码，也没有价值。”<sup>①</sup>生产的符码本身意指一种编码方式，同时也蕴含着相应的解码方式。但不管是编码还是解码，符码本身都具有一种形式上的强制性。正是这种强制性作为“巨大的第二层描述使人们产生了世界客观转变的命定论幻觉”。<sup>②</sup>鲍德里亚由此指出了作为形式之生产的一个根本特质：以第二层次的描述，即某种观念（或概念）来构造第一层次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的命定论就是这种描述的幻觉，也就是生产形式所造成的幻觉。因此作为形式的“生产”是一个以观念（或者说概念）来推延现实的思维方式。对此，鲍德里亚在随后的《诱惑》一书中给出了更为明确的界定：生产（production）“在其原初含义中，并不是产生（fabricate），而是使某种东西成为可见的或者显现出现（make appear）。”<sup>③</sup>这种显现意味着“每一事物都要被合理化，每一事物都要成为真实的、可见的、可计算的，每一事物都可以在力量、概念体系或者可度量的能量中被描述；每一事物都要被说出、积累、分类、显现。”<sup>④</sup>也就是说，生产并非那些被显现出来的东西、那些概念体系，而是这种特殊的“显现方式”，作用于某种事物、使其显现的机制。事物就是在“生产”的作用下，在这些力量、概念体系中被构建起来。

运用观念（概念）来推导现实，这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特质。自柏拉图以来，理念与现实世界就处于分裂状态，现实只有在模仿、分有理念世界，符合理念世界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种本体论的设定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成为了形而上学的基本传统。直到黑格尔，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仍需精神世界中找寻。鲍德里亚所强调的“生产的形式”，意指的就是形而上学的这一传统。在他看来，这一传统“使人们

产生了一切都是为了人自身而‘生产’的幻觉：这是今天普遍化的人道主义主题——不再是‘是’你自己而是‘生产’你自己，这是从意识活动到欲望的原始‘生产’。”<sup>⑤</sup>鲍德里亚在此所强调的乃是形而上学在近代的一种变种：即笛卡尔所开创的以“我思”为核心的近代形而上学。笛卡尔用“我思”确立了主体性原则，从而改变了传统形而上学探求本质的基本方向，但从更为根本的层面来看，他并没有改变以观念（概念）来推导现实的基本模式。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将原来外在于现实的理念世界移植到了人自身之中。世界成为了人自身意识的产物，现实世界最终是为了确证人而存在的。在历经费希特、谢林一直到黑格尔的过程中，这种主观唯心论逐渐转向了客观唯心论，最终使这种主体性原则获得了不断精致化的完善。

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普遍化的人道主义主题”，一切都是为了人而进行的一种“生产”。进一步说，从“我思故我在”到“自我产生非我”，意味着不仅世界是意识的产物，而且“自我”本身也是意识的产物：即所谓“不再是‘是’你自己而是‘生产’你自己”。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在自我意识得以确立之后，作为形式的“生产”在近代形而上学的语境中才能真正实现观念（概念）推延现实世界的活动。因为“自我”是观念或者概念得以形成的源头，也必然成为现实世界得以建构的前提以及最终指向（即客观世界的建构也不过是为了确证自我的存在）。因此，近代形而上学的推延过程总是着力于对自我意识的确认，这也成为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生产之形式的重要内容。对于鲍德里亚而言，如何才能确立自我意识不再仅仅是一个思辨的问题，而是生产之形而上学如何运演自身的问题，即如何在生产之形式中构造世界的问题。对此，我们需要再次回到德国古典哲学找寻其理论根基。

笛卡尔虽然确立了“我思”的原则，但却主要从经验层面上解读我思的含义，因此真正的哲学意义上的自我意识的确立，还有赖于费希特

①②⑤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③④ Baudrillard: *Seduction*,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p34, p34-35.

哲学。费希特第一次明确指出：“你的内在活动指向自身之外的某个东西（指向思维客体），同时返回自身，指向自身。”<sup>①</sup>也就是说，我思（自我意识）的确认需要通过自我意识之外的客观的事物才是可能的。这一点经过黑格尔的工作得以精致化的表述。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是从感性的和知性的世界的存在反思而来的，并且，本质上是从他物的回归。”<sup>②</sup>所谓他物，一方面可视为费希特语境下的非我（自身之外的某个东西）的对应物，另一方面又不同于费希特，黑格尔用自否定的辩证逻辑说明了他物（非我）如何确证自我的过程，其中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异化成为了必要的中介环节，这一点是费希特所没有论及的。而这种异化或者对象化实际上描述了传统形而上学中从理念世界到现实世界的转变过程。让观念（概念）推延出现实的思维方式得到了更富有理性的系统阐发。但在鲍德里亚看来，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都是生产的形式作用的结果。

抛开德国古典哲学关于自我意识的抽象论述方式，鲍德里亚为我们展现了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生产对于世界的构造过程。然而从根本上看，这一过程乃是自我意识确证自身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只不过这里的自我意识被替换成了“人”：“人们到处都学会了反观自身，想象自身，根据这种生产方式设置自身，这被人们看作是最终的价值与意义维度。”<sup>③</sup>“通过生产图式，生产之镜，人在意象中形成了意识。生产、劳动、价值，通过这些，一个客观的世界出现了，通过这些，人们达到了对自己的客观认识——这是一种意象。”<sup>④</sup>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生产”在此被比喻为一面镜子，即照出人自身的镜子。镜子是一个中介、一种形式，相当于自我意识异化、对象化的过程。自我正是在作为“他者”的镜像中才能被真正发现。生产的镜像隐喻直观的显现出了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生产”最终对人自身的确证。

鲍德里亚在谈到生产之镜时对拉康的论述，使我们能够通过镜像理论进一步理解作为形而上学的生产的本质。虽然生产在异化、对象化的活动中确证了自我意识，但这种确证最终却仍然不过是一种意象而已。这一意象并不是真正的现

实，而是某种意象、观念、概念。就如同拉康在镜像理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主体在镜子中所照出的总是一个影像，然而对主体的认知却在这一影像的作用下产生了，因此最终主体也只能是一个虚假的影像。对于生产之镜来说，“生产”作为观念（概念）构成现实世界的过程，现实世界作为他者所确证的也只能是观念（概念）而已。概括说来，生产之镜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生产是一个对象化、异化的过程，需要在他者中确认自身的存在；其二，生产的镜像喻示了一种观念构造现实的形而上学本质。由此不难理解鲍德里亚的这样一句宣言：“必须打破生产之镜，因为在这面镜子中反映着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sup>⑤</sup>

## 二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打碎这面生产之镜？正是在这一问题上，鲍德里亚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马克思。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虽然已经觉察到了生产的形而上学性质，比如马克思批判了经济人的假设，打碎了资产阶级思想中抽象的普遍概念（自然和进步，人与理性，形式逻辑、劳动、交换等等）<sup>⑥</sup>，但是他却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因此鲍德里亚宣布“我们将与马克思主义决裂，这种马克思主义培养了分析资本主义困境而不是革命道路上的专家”。<sup>⑦</sup>

鲍德里亚与马克思决裂的理由，恰恰给我们提供了批判鲍德里亚的切入点。鲍德里亚在此实际上指出了打碎生产之镜的两条道路：其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困境的“分析”，其二，他自身所倡导的“革命”。然而正是由于在鲍德里亚的视域中“分析”与“革命”不能兼容，暴露了鲍德里亚的局限：革命只能意味着全盘的抛弃，革命不能源于现存。这在本质上是一种 A 决不等于非 A 的形式逻辑。而对于马克思来说，他的批判恰恰在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之后获得了根

① 费希特：《费希特著作选集》，第2卷，梁志学编，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59页。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6页。

③④⑤⑥⑦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第4页，第29页，参见第29页，第32页。

本的现实性，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一种自否定的逻辑，将非A看作A的一个必要的环节，由此，“分析”困境恰恰是通向革命的必经之路。就此而言，鲍德里亚与马克思的根本性分歧，是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分歧。

在鲍德里亚的视域中，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生产只能被彻底抛弃，并代之以象征交换及其理论。这是一个基于原始社会交换方式的反生产的交换方式。一切属于生产性的、积累性的、线性的逻辑将被这种耗费性的、可逆性的逻辑所代替。象征交换的意义就在于其与生产的对立。这种对立是一种外在的对立，而不是内在的矛盾。矛盾的德文为 *Widerspruch*，其中 *wider* 就是违背、相反、冲突的意思，*Spruch* 就是说话，因此，矛盾的根本含义在于一句话的自相矛盾。这种矛盾构成了一种内在发展的动力，在辩证法的意义上是不可缺少的。任何一种真正的发展都需要包含新的（非A）元素，而这一元素与原有事物之间的矛盾恰恰构成了该事物发展的动力。这就是辩证法的力量。然而，在形式逻辑的视域下，矛盾乃是一种必须被抛弃的外在对立。因此在形式逻辑中，A等于A只能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同义反复。

作为一个理性的批判者，鲍德里亚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辩证法。在他看来，辩证法所彰显的是理性的张力与弹性，理性在其中通过制造矛盾，将否定性元素纳入理性之中，从而使任何反理性的诉求最终都变成理性发展的一份子。因此鲍德里亚认为在马克思思想中，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划分乃是理性内部的二元分裂，正是这一结构束缚了马克思，使其最终没有能够逃离其着力批判的资本主义逻辑。具体劳动与使用价值作为符合人性的两个概念，乃是抽象劳动与交换价值的否定性力量，但它们最终却通过辩证法的扬弃变成了“劳动”与“价值”这两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得以普遍化的必要环节。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不仅没有扬弃资本主义，反而在顺应资本主义的逻辑基础上帮助它们更为良性的发展：“在对资本的激进逻辑分析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西方理性主义观点仍然保持着一种人类学的共识，这种观点在18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中获得了确定的形

式。科学、技术、进步、历史——在这些观念中，我们具有了一个完整的文明观念，这种文明认为是自己带来了自身的发展，并以自身的辩证力量实现了人的总体性和人的幸福。因此马克思没有创造起源、发展和目的性等概念。他没有改变事情的根本，即认为人在其无限的决定中造就了自身，并以自身为目的不断地超越自己的观念。”<sup>①</sup>

在这一批判中，有两个关键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辩证法所带来的文明体系内的自发展；其二，人的决定与目的构成的诸多观念造就了自身，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批判逻辑仍然是概念构造现实的一个变种。由此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生产的固有思维方式。对此，我们首先要问的是鲍德里亚为什么如此反对辩证法？他所指向的辩证法与马克思所推崇的辩证法是否存在差异？

鲍德里亚对待辩证法的态度显然与马克思不同。在我们看来，正是由于对辩证法理解的偏差加固了他对生产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因为在鲍德里亚的视域中，辩证法本质上永远是概念的辩证法：“辩证法并没有逃出任何一种批判的命运。也许，将唯心主义辩证法颠倒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形态的变化；也许，政治经济学、资本和商品的逻辑才是辩证的；也许，生产的幌子遮住了它致命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实际上只是提供了一种描述的理论。对客观对象加以复制的表象逻辑，离不开所有的理性推理，任何一种批判理论都离不开这种秘密的宗教。”<sup>②</sup>（黑体为笔者所加）对马克思的这种批判恰恰暴露了鲍德里亚理解辩证法的问题所在。因为在他看来，唯物主义辩证法与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区别仅仅是一种外在形式上的区别。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工作仅仅在于运用了一些不同于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核心概念，如资本、历史、生产等概念，正是这些基本概念辩证法构成了马克思的思想。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仍然不过是一种描述的理论，一种复制客观对象的表象逻辑，一种与现实无关的理论推理而已，其作用仅仅在于推动核心概念的运转。这样，马克思思想就被归结为一个概念的体系，一个用概念来推延现实的形而上学。

<sup>①②</sup>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第33页。

## 三

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解，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乃是一种共谋关系，因为二者都不过是在概念体系中打转而已。鲍德里亚试图通过对辩证法的批判，彻底否定一切既有的概念体系，以实现一种激进性革命。然而，问题在于鲍德里亚对辩证法和生产的理解都以自己的逻辑为前提，武断地将其纳入到既定的批判路径上来，从而使其对马克思思想的判断不无偏颇之处。

马克思虽然将生产视为“一种普照的光”，“一种特殊的以太”，<sup>①</sup>但他从来没有把生产视为一种抽象的形式，也从来没有按照鲍德里亚所谓的“生产之形式或者原则”来框定现实生活。相反，马克思总是在反复强调“一定的生产”<sup>②</sup>的意义上使用生产。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中的生产都是“一定的”、历史的，因而不能抽象为一个普遍的、一致的生产之形式。“生产”在马克思那里既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就是人的现实的活动本身。事实上也正是为了让理论深入现实生活，马克思才采用了“生产”这一提法，他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热衷也是由于它在当时是唯一一门以深入社会现实为前提的学科。“在政治经济学里已经提出了一种思想：主要的剥削关系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是由整个生产决定的，单独的个人都面临着这些关系。”<sup>③</sup>

而鲍德里亚却想当然地把政治经济学视为一种推延现实的概念体系，殊不知政治经济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切入社会现实为目标。最早的威廉·配第用政治算术创立了一种面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科学，即政治经济学，这一事实说明政治经济学总是一门基于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学问。无论是重商、是重农、还是重一般劳动的价值，政治经济学从来都是基于社会现实之上的。萨伊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探究社会上实际存在的事物的本质与发展过程”<sup>④</sup>认为“这门科学不是建立在假设上面，而是建立在观察结果和经验上面。”<sup>⑤</sup>李斯特也认为“关于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读到的最好的书本就是现实生活。”<sup>⑥</sup>马克思以生产为核心所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非一个自我运转的概念体系，而是用来突破固有形而上学的一种途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于沿用“生产”的概念是否意味着马克思陷入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之中，从而丧失了其根本的批判性呢？这是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指责。然而，事实上这正是马克思在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有益元素之后所能够找到的最富现实性的批判道路。值得注意的是，生产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拥有多种表现形式，但无论在那种形式中，它作为人的现实活动的基本内涵没有改变。概括说来，在马克思那里生产拥有两类不同层次的含义：其一，哲学意义上的生产，它一般被表述为感性活动、劳动或者实践。其中感性活动、劳动与实践都意指人的对象性活动。由于劳动出现的频率高于感性活动和实践，因此我们在此以“劳动”这一概念来指代这一哲学内涵。这一内涵集中于马克思早期思想之中，表面看来尚带有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色彩，但实质上却已经展显出马克思的基本路向：对现实的个人、现实的活动的强调。其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它被直接称为“生产”，并作为与消费、交换、分配并列的一个环节而存在。这一环节是马克思将批判的视角转向现实生活本身的显现。从总体上看，哲学与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相辅相成，不可截然分割，但也不能相互混淆。鲍德里亚的问题恰恰在于将这两种意义上的生产混淆起来，将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不加分辨地视为哲学意义上的“劳动”，并将其直接视为抽象的概念，从而使生产完全丧失了现实性，最终与马克思的本意背道而驰。

具体而言，鲍德里亚的“生产”所对应的其实仅仅是马克思生产概念的第一层含义，即对应于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劳动概念。在批判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时，马克思曾经指出黑格尔的劳动概念的积极意义：“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

<sup>①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参见第44页。

<sup>③</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3页。

<sup>④⑤</sup>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8页，第49页。

<sup>⑥</sup>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页。

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sup>①</sup>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黑格尔的局限：仅仅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方面，而忽视了它的消极方面。“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们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sup>②</sup>

马克思则在确认劳动的肯定性方面的同时，指出了劳动的否定性：即异化劳动的存在。异化劳动不仅没有确证人，反而成为控制人的力量。马克思通过对工人现实的生活状态的考察发现了劳动的异化，这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即“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sup>③</sup>简而言之，就是不是通过概念来推演现实，而是通过现实来把握概念。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sup>④</sup>并且“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后面将对这一点作更清楚的说明）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sup>⑤</sup>在对蒲鲁东进行批判的时候，马克思就明确指出蒲鲁东“同空想主义者一样追求一种所谓‘科学’，以为由此就可以 a priori [先验地] 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而不从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不从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引导出科学。”<sup>⑥</sup>

基于这一原则立场，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进行批判时明确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sup>⑦</sup>这是真正立足于社会现实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中找到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设定，而是现实的革命道路。这就是马克思所推崇的辩证法，即在肯定的方面中发现其固有的否定方面。这种辩证法从来都不是概念范畴的自我否定与推延，而总是社会现实自身具有的内在推动力。它所推动的也绝非思维的演进，而是历史现实的前进发展。鲍德里亚恰恰没有看到马克思辩证法中的这样一个本质性方面，而将其混同于纯粹思维概念的辩证法。这也就决定了他同样看不到马克思对生产的考察从一开始就不是从概念范

畴，而是从社会现实出发的，因此其最终确证的也是现实的生产，而不是概念的生产。从根本上看，生产与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不再是两个外在平行的概念，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异化劳动作为生产辩证法的否定性环节现实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更进一步看，生产辩证法乃是马克思切入并批判社会现实的一种基本视角：即以生产的辩证法为契机的现实批判。

正是由于马克思发现了生产的辩证法，所以他在随后进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中用生产概念替代了哲学意义上的“劳动”概念，并放弃了感性活动的提法，也很少使用实践概念。这种语词的转换说明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的辩证法中发现了社会现实的切入点，并由此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包含的巨大意义，因此基本放弃了黑格尔意义上的那种“对象化活动”的语境，从而彻底转向了现实的“生产”。这一生产仍是人的现实活动，但它已经不再能够用抽象的对象性活动来予以界定，而是需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实现的现实的具体活动。从性质上看，这一活动绝非由生产、历史、辩证法等概念构成的概念体系或系统；而是现实的人所从事的现实的现实的活动。鲍德里亚由于固有理论视野的局限而将马克思的生产辩证法误解为前者，并将其比喻为一种生产之镜，认为这一镜子照出的只是概念推延现实的“生产”形式和原则，因此必须打碎生产之镜，进而破除形而上学。仅就鲍德里亚的理论体系自身而言，这一结论似乎合情合理，但问题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面生产之镜，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自始至终都是人的现实的活动，这一活动本身就是辩证的。因此鲍德里亚的马克思批判乃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的，这一误读的根源在于鲍德里亚未能真正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源头和切入社会现实的基本性质和品格。

(责任编辑 林 中)

①②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第163页，第117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第6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2页。